

吴晨辉, 张争胜. 南海《更路簿》“遗产化”的路径和机制 [J]. 地理科学, 2022, 42(6): 1055-1063. [Wu Chenhui, Zhang Zhengsheng. The heritagization of local relics: A case study of *Gengluubu*.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42(6): 1055-1063.] doi: 10.13249/j.cnki.sgs.2022.06.011

南海《更路簿》“遗产化”的路径和机制

吴晨辉¹, 张争胜²

(1.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2.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遗产化”是一个动态复杂的社会过程。基于在海南省琼海、文昌两市的田野调查, 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融合的研究路径, 分析手抄南海航行路线指南《更路簿》“遗产化”路径和影响机制, 以及交织在其中的复杂社会关系和地方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他者”和海南渔民在《更路簿》“遗产化”过程中会产生相互作用, 其作用力量强于“我者”;《更路簿》由渔民家庭内部相传的用于出海作业的“秘本”转为公共领域的具有主权物证价值的“文化遗产”, 渔民被赋予了南海“发现者”“经营者”的身份标签; 文物收集和文化活动推进了“遗产化”并使不同群体产生互动, “我者”可在“他者”开展的遗产工作中干预“他者”的遗产认知和行为方式;《更路簿》可转化为旅游资源, 但尚未形成强有力的“卖点”带动旅游业, 居民在利用其带来的经济机会方面处于弱势;“遗产化”有助于《更路簿》记忆的复现和保存, 但渔民的“个体记忆”被削弱, 也使地方文化结构被重构;《更路簿》在琼海的植根性和“遗产化”效果强于文昌。

关键词: 遗产; 更路簿; 南海; 身份认同; 遗产旅游; 文化记忆

中图分类号: K9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22)06-1055-09

遗产包含着人们对过去的重新解读, 是身份的重要象征和来源^[1], 也是一种教育和政策工具^[2]。“遗产化”是从本质遗产(heritage in essence)到认知遗产(heritage in perception)的过程^[3], 是某一历史遗存在制度意义上被认定为“遗产”并对其进行保护、开发和管理的过程^[4]。聚焦“遗产化”, 是将静止的、孤立的“物”置于特定空间内动态的、复杂的人群关系中, 从而剖析不同群体在“遗产”生成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近些年, “遗产化”已逐渐受到了国内外地理学者的关注^[3-5], 成为遗产地理研究的重要议题。此外, 文化遗产已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或手段^[6]。开发和利用各种文化遗产, 如民族手工艺、建筑、艺术、节日和仪式、歌曲等, 已被视为开展中国扶贫项目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7]。因此, 探究一个地方的民间遗存变为“文化遗产”的过程, 即“遗产化”, 以及交织在其中的复杂社会关系和地方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批判遗产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是西方学者基于对关注遗产物质性和管理与保护等技术

层面以及赋予特定群体遗产话语特权的“权威性遗产话语”(Authorised Heritage Discourse)^[8]的批判, 它认为遗产是一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9], 并强调非特权群体的遗产话语^[10]。尽管国外遗产研究成果为分析遗产作为政治、经济、身份符号背后交织的权力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10-12], 但它们太过重视“权力”而容易忽略“地方”与遗产过程的复杂关系, 而遗产研究学者也开始认识到遗产与地区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的重要性^[12], 因此从地理学视角审视“遗产化”过程对批判遗产研究的发展十分必要。目前, 国内地理学者多关注景观基因解读^[13-15]、时空分布^[16,17]、保护路径^[18]等遗产的物质性、保护和管理等技术层面, 倾向于“权威性遗产话语”研究范畴, 该话语强调专家等精英群体对遗产解读的经验价值。然而, 一些学者已经超越了解读遗产本身, 而开始关注遗产背后的社会政治空间问题, 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分析遗产过程并强调非特权主体的话语和参与, 如屈册等^[19]将视角转向社区居民的遗产话语和认知, 王雪等^[20]、庄淑蓉等^[21]揭示了遗产地开发和

收稿日期: 2021-08-10; 修订日期: 2021-11-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7ZDA189)资助。[Foundation: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17ZDA189).]

作者简介: 吴晨辉(1995-), 女, 河北邯郸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社会文化地理、遗产地理研究。E-mail: wuchh28@mail2.sysu.edu.cn

通讯作者: 张争胜。E-mail: zhangzsh@scnu.edu.cn

利用过程中的空间非正义现象。它们倾向于展示不同群体包括政府、企业、专家等和本地居民、游客、商家等对于遗产“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认知、利用、话语等方面的差异甚至博弈^[22-25]。虽然这些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围绕遗产的空间社会关系以及提供了中国遗产地理研究的批判视角,但是它们过于强调不同群体基于多元话语构建的遗产空间的异质性,而容易忽略不同群体或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织过程。事实上,批判遗产理论强调用互补而非对立的视角来审视多元话语,权威性话语和其他话语在互动中不断发生变化^[26]。因此,地理学者在探究围绕遗产发生的地方或空间变化的复杂过程时,应关注到不同群体的相互作用和交织过程。

本文认为,分析遗产过程不能简单地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对立或二分视角。对此,本研究采用二者相融合的研究路径,通过审查不同行动者在制作“遗产”过程中的互动或交织来追踪地方遗存“遗产化”的过程,从而帮助厘清遗产背后的复杂社会关系和地方影响因素。基于此,本文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海南渔民的手抄南海航行路线指南《更路簿》为例,基于在海南省琼海、文昌两市进行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揭示“他者”与“我者”在《更路簿》“遗产化”过程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参与形式,以及二者的复杂交织如何推动“文化遗产”的生成,并通过对比《更路簿》在两地的遗产过程,探究地方因素对“遗产化”的推动或阻碍作用,从而揭示“遗产化”的路径和机制,以及丰富遗产地理研究的批判视角。需指出,本文将拥有独立的文化背景和地方认同、仅仅出于某种短时间的任务接触《更路簿》、对《更路簿》的认知和评价来自于挖掘探索过程或与本地渔民和居民的互动的行动群体,包括政府、博物馆、媒体工作人员和学者等,定义为“他者”;将长期生活在孕育《更路簿》的地理和文化环境中的本地渔民和居民定义为“我者”。“我者”不仅熟悉《更路簿》产生及运用的物质环境,同时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对《更路簿》文化具有较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保留着《更路簿》的物质和记忆元素。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更路簿》是中国海南渔民编撰的并在家族内部世代相传的“秘本”^[27],一般为船长秘藏,它是帆

船时代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从事渔业生产的航海指南。因搜集的大部分版本中的航行路线中均有“更”和“路”,故将海南渔民所用的航海针经书统一命名为《更路簿》^[28]。“路”表示航向,即罗盘的针路。“更”为航行的路程,也表示从起点航行至终点需要的时间。目前对于“更”的计量在学术界还无统一论,笔者通过采访老船长得知“一更”约为10海里(18.52 km),在顺风顺水的条件下帆船航行“一更”约2 h。《更路簿》记载的内容通常包括气象、水文和航行路线等,其中国内航线目的地包括西沙、南沙群岛各岛礁。《更路簿》记载的岛礁名称,皆为海南渔民根据岛礁的形状、位置、颜色、地貌、生物以及传说等使用琼海方言命名的,世代相传,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29]。

随着现代航海工具的普及,《更路簿》的实用价值消失。由于可捕捞的渔业资源减少,越来越多的渔民“弃海”转向其他行业,使用《更路簿》的传统渔民社会结构趋于瓦解。安全、收入等因素使渔民“做海”空间大大缩减,《更路簿》的复现空间缩减,生存植根性减弱^[30]。因此,《更路簿》在自然状态下面临着消亡的命运。2008年,海南省文昌市申报的“南海航道更路经”(俗称“更路簿”)首次被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琼海市相继于2011年补充申报“南海航道更路经”,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项目。在制度框架内,《更路簿》这一民间遗存正式成为“文化遗产”。

1.2 数据来源及分析

笔者于2017—2019年多次前往海南省琼海市和文昌市展开田野调查,包括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通过立意抽样(即调查人员根据主观经验刻意寻找的研究对象)^[31]和滚雪球抽样(即通过个别受访者获得更多的研究对象)^[32],本文共选取72名访谈对象,包括文昌24名渔民和居民,琼海25名渔民和居民、2名纸媒编辑、7位国家级或省级和14名省级以下政府、公共服务机构(如博物馆)工作人员。为维护受访者的隐私,文中出现的所有名字均为匿名的字母编号。受访渔民和居民年龄为28岁至89岁之间。大多数访谈使用普通话,但对少数不会说普通话的老渔民的访谈借助了当地其他居民的翻译。根据渔民和居民意愿,访谈在受访者家中、店铺、海边、茶馆、餐馆、工作单位等不同地点进行,每个访谈持续约0.5~1.5 h。受访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想法随意回答每个开放式问题,并鼓励引

发新的话题。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核心式编码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和整理^[33](表 1),从而获取最终结果。

2 “遗产化”的驱动:《更路簿》价值意涵与文化主体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南海周边国家不断地挑衅中国在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领土主权。1980 年,中国外交部发表外交报告《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无可争辩》,并引用《更路簿》作为历史证据之一证明中国人民早在唐、宋时期就已在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生产作业。这是《更路簿》的主权物证价值首次得到官方认定^[35],并引起了一些精英人士对《更路簿》的关注和探索。进入 21 世纪,南海纷争依旧时有发生,进一步吸引了大量学者和媒体、政府工作人员对《更路簿》的挖掘和研究^[28,36]。“他者”调查、收集《更路簿》时会与文化主体产生大量的交流和互动,以从渔民处获取《更路簿》文本及解读,从而夯实《更路簿》的“历史证据”价值意涵,而渔民或多或少会内化“他者”的遗产认知,渔民对《更路簿》的认知和态度由被淘汰的“废纸”转变为能够证明中国拥有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主权的“文化遗产”,例如一位老船长的叙述:“之前只知道一点新闻,后来记者专家都来(采访我们),我就更关注(南海局势)了。《更路簿》是老一辈用的东西,现在没有人用了……但它是我们老祖

宗一代代传下来的,是我们最早开发南海的证据……比如太平岛在我们的《更路簿》上是黄山马,这就是证据证明我们的南海主权”(琼海渔民 A,船长)。

也可以看出,渔民的国家意识更加强烈,并且有意识地将《更路簿》这一家庭遗存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在过去,南海于渔民而言更倾向是家庭的“耕地”,而《更路簿》是流传于家庭内部的航海“秘籍”。在《更路簿》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这一私人领域的遗存转向了公共领域的“文化遗产”,由于公共叙事的强化以及在其影响下渔民观念的转变,又基于中国南海主权与渔民生产作业的切身利益相耦合这一现实,渔民所感知的“家”-“国”空间界线被打破。“家”-“国”尺度间的转化是海南渔民“家国命运共同体”这一隐性基因上升为显性基因的过程。

在《更路簿》被升华为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正统性符号的同时,海南渔民被权威性话语赋予了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发现者”和“经营者”的身份标签。渔民的航海知识(判断天气、方位)和文化、开发南海的历史事迹(渔民自发命名南海诸岛和海域、在被别国非法拘留后拒签有损中国利益的文件^[36]等)通过纪录片、媒体报道、学术专著等权威性途径得以挖掘和曝光。此外,文昌和琼海共设立了 3 位省级和 1 位国家级传承人,他们均有丰富的远海作业经历,他们在公共语境下被表征为一个群体特性

表 1 《更路簿》“遗产化”72 份访谈资料的选择式编码和主轴式编码

Table 1 Selective coding and axial coding of 72 interviews of heritagization of *Genglubu*

核心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	材料来源(人数/人)	参考点示例
价值意涵	南海主权	63	《更路簿》是我们证明南海主权最有力的证据
	渔民身份认同	29	潭门 ^① 渔民对南海的贡献很大的,潭门的捕鱼作业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他们依赖岛礁,有利于巩固主权
遗产保护	文化活动	42	传承《更路簿》的活动有很多,比如研习会、海上重走《更路簿》
	文物收集	16	我们会到沿海乡镇普查,采录去过南海的老艚公(老船长)的经验,形成文字保留下来……长期征集《更路簿》实物
	旅游	32	近几年渔业资源减少了,我们这两年的方向就是结合《更路簿》和休闲渔业打造旅游
文化记忆	记忆复现	27	中央的记者来采访我,让我讲我出南海的故事,我对南海的感情很深,当时我都把他讲哭了
	“集体记忆”	15	他们已经被很多媒体专家采访过了,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回答模式,现在每个渔民讲的东西都差不多
	重构地方文化	11	他们(渔民)现在记得的全都是关于《更路簿》的了

① 潭门镇,地处海南省琼海市东部沿海,海岸线长 18 km。2009 年,潭门镇的中心渔港被国家农业部评为一级渔港。潭门渔民是世界历史上唯一连续开发利用南海西、南、中沙海域和岛礁资源,且现今仍然保留远海作业方式的群体^[34]。

和身份的“缩影”，进一步塑造了海南渔民之于南海贡献的身份形象。

文昌渔民在西沙、南沙捕鱼作业的时间早于琼海渔民，但自清末琼海渔民逐步成为南海远海作业的领军者^[34]。如今，文昌渔民逐渐淡出远海海域，而《更路簿》是用于远航捕鱼的指南，因此，生产空间的萎缩使其在文昌渔民群体中淡化加速，目前收集的 21 本《更路簿》只有 4 本来自文昌，有 17 本来自琼海。相较于琼海，文昌渔民对《更路簿》的认知程度较低，如“我们这里知道《更路簿》的人不多，琼海（渔民）就去西沙南沙多一点，我们比不上他们”（文昌渔民 C，船长）。而琼海潭门渔民是世界历史上唯一连续开发利用南海西、南、中沙海域和岛礁资源，且现今仍然保留远海作业方式的群体。2013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到潭门镇考察，肯定了潭门渔民耕耘南海的历史功绩^[37]，加深了公众对琼海潭门渔民的身份认同，《更路簿》已成为琼海潭门特有的文化符号。因此，文化主体是决定“文化遗产”在地方的植根性的核心因素，即使文昌市率先申请《更路簿》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其文化主体的生产生活与《更路簿》长期脱离，而琼海渔民维持至今的远海作业方式，致使《更路簿》在琼海留存和植根程度更高。

3 “遗产化”的推进：保护措施与旅游资源化

3.1 文物收集与文化活动

对于《更路簿》这一濒危的民间遗存，收集和宣传是推进其“遗产化”的主要环节，“他者”与“我者”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政府通过拉横幅、制作宣传展板、设立采录点等在公共物理空间注入权威性话语等途径吸引居民的关注，而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媒体记者利用信息空间宣传、博物馆有偿征集等方式参与收集过程。在“他者”征集工作中居民惯常的思维被干预，使人们回忆起日常的、无意识忽视的事物，以提供遗存物品作为“文化遗产”的物质元素，从而参与文物收集过程。例如，文昌政府工作人员 E 指出：“我们每年在各乡镇进行图片资料巡展，让更多人特别是老渔民了解这个项目（更路簿），然后发动群众收集实物。效果不错，一些老百姓会主动联系我们说家里有以前船上的实物，如喝酒的壶”。

“他者”出资以及利用专业知识和技能开展的一系列文化活动，包括《更路簿》研习班、纪录片拍

摄、博物馆展览、著书、重走《更路簿》海上体验活动等，为《更路簿》知识和历史的解析、传播推广、收集和保护提供了权威性路径和平台，而渔民主要以其传统实践知识和航海技能参与文化活动并与其他群体产生互动。例如，学者在研习班讲授《更路簿》历史意义等理论层面的知识，老船长传授识别海图、罗盘、测量距离等传统航海技能，体现了群体间的差异性；学者向渔民提问以解决研究中的疑惑，渔民通过学者的讲授转变了对《更路簿》的价值认知，二者产生交融。此外，“他者”与渔民的合作使他者进入地方遗存的社会建构空间成为可能，进而影响“他者”对的遗产认知。例如，“重走《更路簿》海上体验活动”主办方邀请渔民提供渔船并操作航行，“他者”在具身体验过程中与海南渔民产生“共情”，深化了对《更路簿》的理解和文化主体的身份认同。活动组织者谈到：“大家感觉到潭门渔民真是不简单，渔船不像邮轮那么大，我们都晕船吐了一路，渔民说‘我们都吐习惯了’。我们在船上也开展传承活动，邀请国家级传承人给我们讲怎么用《更路簿》、罗盘航海，介绍渔民以前怎么捕捞、看风向、测水深等等，大家很感兴趣，我们也上岛考察了解渔民岛上的生活。一起出过海的人感觉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去年回来说‘啊~我们也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了’，所以他们民风很好，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这也造就了他们敢闯的精神，那些老渔民身体都很硬朗，像苏公（年龄 80+）早上骑自行车出去喝茶、买菜做饭……他们也很容易满足，经过大风大浪的人胸怀都很宽广，好像‘除了死也没什么了’”（琼海政府工作人员 H）。

3.2 “文化遗产”与旅游

旅游是保存记忆、传承地域文化和构建地方性的重要载体，也是遗产保护的路径和促进文化认同的媒介^[1]。当前，文化遗产作为“多彩的”和“原始的”资源，已被广泛用于旅游开发从而提高收入^[7]。《更路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可以成为一种旅游资源应用于旅游发展，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又可进一步推动“遗产化”。琼海市潭门镇组织开展的一系列旅游活动已融入了《更路簿》元素，如 2015 年起政府举办的“潭门赶海节”、2017 年又在潭门镇启动的首届“更路簿杯”国际帆船赛，在旅游活动中《更路簿》的社会、文化价值得到进一步的宣传，成为“遗产化”的重要推动力。然而，缺乏知名度、文化产品创意等因素使《更路簿》尚未成为强有力的

吸引游客的“卖点”。

在政府开展的旅游活动中, 渔民主要以表演、竞赛的形式参与其中, 如潭门赶海节开幕式包含的表演“祭兄弟公出海仪式”和舞鲤鱼灯、拔河比赛等。此外, 一些居民开始借助“更路簿”品牌向旅游产业转型, 例如“更路簿”主题的民宿和工艺品店、潭门渔民自发组织成立了“更路簿”休闲渔业协会等。例如, 琼海居民谈到: “我当时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爷爷叫我回来说现在机会来了……我回来后注册了更路簿文化公司, 建立了更路簿历史馆, 从事工艺品行业……我觉得现在地方转型应该朝着文旅方向发展, 民俗、农家乐……”(琼海居民 J)。

然而, 由于自身能力和资金的局限, 大部分居民并不能参与其中获取利益。此外, 与琼海相对比, 在文昌《更路簿》尚未与旅游活动相结合, 无论是政府还是居民层面, 《更路簿》都未被利用变为旅游资源, 仅表征为文化政治符号且仍停留在政府层面。缺乏旅游的推动也是文昌的《更路簿》“遗产化”效果弱于琼海的原因之一。

4 “遗产化”的根基: 文化记忆

记忆是遗产的根基, “遗产化”离不开记忆的复现, 这是由于真正吸引人们的是遗产包含的记忆, 而不是遗产本身^[38]。《更路簿》原初面临着文化断裂、记忆残缺的危机, 然而在“他者”的“抢救”下, 包括学者的深度挖掘和研究、媒体记者的采访和宣传、博物馆等机构的收集和展览、政府举办的相关文化活动等, 《更路簿》文化记忆得以复现和留存。在文化记忆方面, 渔民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凸显, 他们提供的遗存物品和出海捕鱼经历塑造了《更路簿》文化记忆, 进而干预“他者”对海南渔民和《更路簿》的认知以及开展遗产工作的行为方式, 如: “我们在馆内会搭一些渔民生活的场景, 我们生怕我们展示的不符合他们的历史和文化, 所以会请当地的老船长来看看符不符合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博物馆工作人员 L)。

“遗产化”也是记忆重塑的过程^[39], 以满足当前社会的需要, 而这又是历史遗存在当今社会“遗产化”的基础。“他者”在开展遗产工作时与渔民的互动和交流以《更路簿》为主, 无形中复现和加深了渔民有关《更路簿》的文化记忆。但是随着二者之间互动的累积, 渔民的表述趋于“一致”, 个体记忆逐步弱化, 从而似乎形成了一个固定版本的“集体

记忆”。

“他们(海南渔民)已经被采访太多次了, 要回答的东西已经刻在脑子里了, 每个人回答的都差不多, 如果你再问新的问题, 他可能反应不过来……他们现在记得的全部都是围绕《更路簿》的东西了。”(纸媒编辑 L)

笔者在访谈间也有同样的感受。可以看出, 《更路簿》以外的文化记忆呈边缘化和模糊化趋势, 而“更路簿”在潭门渔民文化认同中被放置突出位置, 地方想象被重构。

文昌的《更路簿》遗存文本较少、远海作业方式的中断等, 使《更路簿》文化记忆在文昌保留较少。虽然个别文昌老渔民持有一些《更路簿》记忆, 但潭门渔民更广泛的出海范围、更丰富的航海记忆更能吸引“他者”的关注, 因此“他者”与文昌渔民的互动远低于琼海渔民。文昌受“他者”的关注和干预较少, 使得《更路簿》对文昌地方想象或文化结构的影响十分有限。

综上, 对《更路簿》“遗产化”的路径和机制归纳如图 1。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融合的研究路径分析表明, 政府工作人员、媒体记者、学者等“他者”和渔民和居民“我者”共同推动了《更路簿》“遗产化”, 在此过程中二者产生了相互作用, 但“他者”作用力量强于“我者”。二者的话语具有差异性, 但并非二元对立, 而是在“遗产化”过程中不断地对话、相互干预甚至互补。“他者”通过制度、博物馆展览、政府收集工作和文化活动、媒体的传播、学者的探究等权威性物质环境、话语和行为对《更路簿》的“遗产化”进行了有力的推动, 以及影响居民的遗产认知、身份认同和地方文化和生活; “我者”主要通过提供《更路簿》实物及解读、航海知识和技能、海上活动和经历等为“文化遗产”提供物质性和非物质性载体和基本内涵, 并对“他者”的遗产认知和遗产工作方式产生干预和影响。

“遗产化”促使《更路簿》由渔民家庭内部相传的航海指南转为公共领域的“文化遗产”和支持中国南海主权的“物证”, 以及海南渔民被赋予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发现者”和“经营者”的身份标签。文化主体是决定“文化遗产”在地方的植根性的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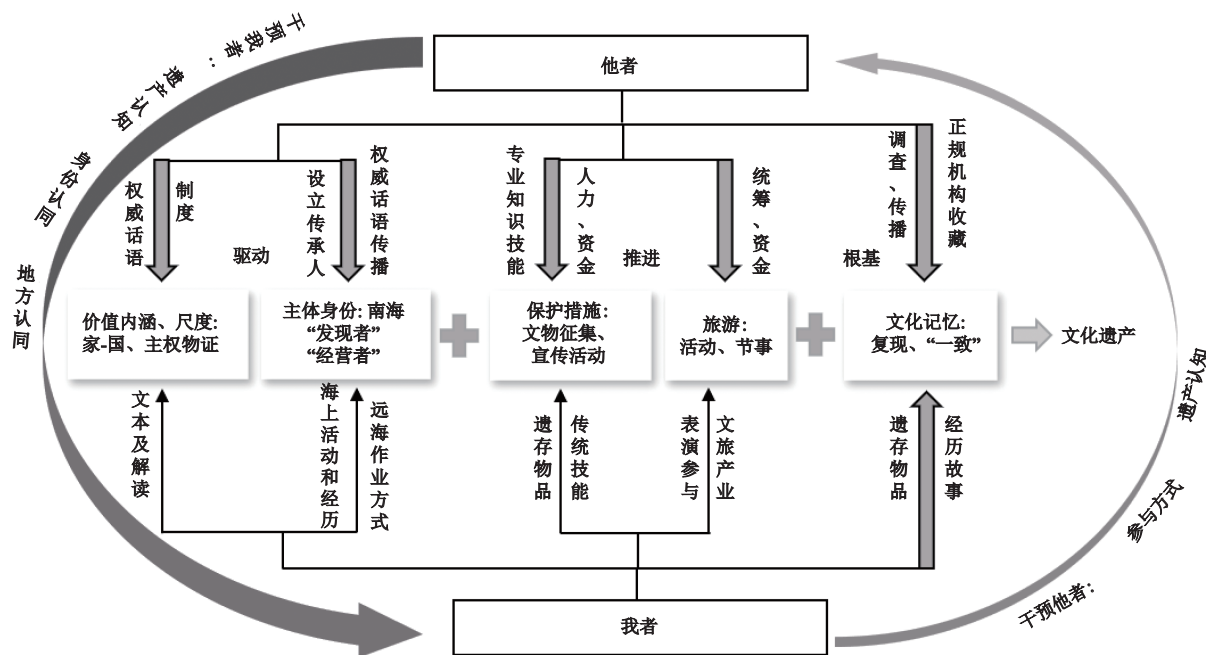


图1 《更路簿》“遗产化”的路径和机制

Fig.1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demonstrating the process of heritagization of Genglubu

心因素,不同于文昌,琼海渔民至今仍维持远海作业方式,致使《更路簿》在琼海留存和植根程度更高。“文化遗产”可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又可进一步推动“遗产化”,而与琼海相比,《更路簿》在文昌尚未与旅游活动相结合。“遗产化”有利于《更路簿》记忆的复现和保存,但“他者”挖掘记忆的过程削弱了文化主体的“个体记忆”,逐步形成了一个固定版本的“集体记忆”。而相较于琼海,《更路簿》在文昌的植根性较弱,记忆保留程度低,因此它对文昌地方文化影响较小。

5.2 讨论

在中国,文化遗产已成为一种治理手段,地区发展的重要资源^[7],以及地方认同的关键来源。因此,研究一个地方遗存的“遗产化”过程及其影响机制,对中国遗产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更路簿》提供了一个地方民间历史遗存由“濒临消失”转变成“文化遗产”的典型案例,该“遗产化”路径能够及时保护和留存濒危的地方遗存、深化文化主体对遗产的认知、为地方发展或乡村振兴提供文化经济元素,然而本地居民利用和管理遗产的弱势地位、“集体记忆”固化风险等问题亟待探讨和解决。遗产与地方密切不可分割^[40],本研究对比了《更路簿》在文昌、琼海两地的现状,揭示了文化主体、生产环境和遗产经济符号显现程度是影响民间遗存“遗产化”

“文化遗产”植根地方的效果的主要因素。

不同于大多数研究倾向于论述不同群体对“文化遗产”的利用和管理的话语差异以揭示他们的分歧或对抗关系,本文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方法融合于同一分析框架,既不否认“他者”在遗产过程中的特权,也不忽视“我者”的能动作用,聚焦于二者之间的动态互动过程以及作用方式,揭示了遗产过程中不同群体行为、话语的差异和交融,以及他们共同对遗产内涵和价值符号、遗产工作、文化主体身份认同、文化记忆和地方文化结构等产生的影响,为探究“文化遗产”的生成以及交织在其中的复杂社会关系和地方影响因素提供一个分析框架,丰富遗产地理的批判研究视角。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Henderson J. Heritage, identity and tourism in Hong Ko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01, 7(3): 219-235.
- [2] Harvey D C. Heritage and scale: Settings, boundaries and rela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15, 21(6): 577-593.
- [3] 燕海鸣. “遗产化”中的话语和记忆[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08-16(12). [Yan Haiming. The discourse and memory during the process of heritagization. Social Science Weekly, 2011-08-16(12).]
- [4] 周小凤, 张朝枝. 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化与旅游化的关系演变与

- 互动机制[J]. 人文地理, 34(3): 154-160. [Zhou Xiaofeng, Zhang Chaozhi. The relation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heritagization and tourismification in Hani terraces of Yuanyang. Human Geography, 34(3): 154-160.]
- [5] Sjöholm J. Heritagisation, re-heritagisation and de-heritagisation of built environments: The urban transformation of Kiruna, Sweden [D]. Sweden: Luleå Tekniska Universitet, 2016.
- [6] Zhu Y, Maags C. Heritage politics in China: The power of the past [M]. London: Routledge, 2020.
- [7] Chen Z, Ren X, Zhang Z. Cultural heritage as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atik production amongst China's Miao population[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1, 81: 182-193.
- [8] Smith L. Uses of heritage [M]. London: Routledge, 2006: 284-303.
- [9] Gentry K., Smith L. 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 and the legacies of the late-twentieth century heritage can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19, 25(11): 1148-1168.
- [10] Graham B J, Howard P. 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heritage and identity [M]. London: Ashgate, 2008.
- [11] Smith L. Heritage, identity and power [M]// Hsin-Huang M H et al. Citizens, civil society and heritage-making in Asia. Singapore: ISEAS Publishing, 2017: 15-39.
- [12] Winter C. Tourism, social memory and the Great Wall[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9, 36: 607-626.
- [13] 翟洲燕, 李同昇, 常芳, 等. 陕西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识别[J].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9): 1067-1080. [Zhai Zhouyan, Li Tongsheng, Chang Fang et al. Genes identific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landscape of Shaanxi Traditional Village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7, 36(9): 1067-1080.]
- [14] 于希贤, 于洪. 挖掘和保护文化基因是历史文化村镇保护之本——读《家园的景观与基因》有感[J]. 地理研究, 2015, 34(5): 1001-1002. [Yu Xixian, Yu Hong. Excavating and protecting cultural genes is the foundation of protecti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illages and towns: Thoughts on *Landscape and Gene of Homeland*.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5): 1001-1002.]
- [15] 胡最, 刘沛林, 邓运员, 等.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识别与提取方法研究[J]. 地理科学, 2015, 35(12): 1518-1524. [Hu Zui, Liu Peilin, Deng Yunyuan et al. A novel method for identifying and separating landscape genes from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35(12): 1518-1524.]
- [16] 程乾, 凌素培.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 地理科学, 2013, 33(10): 1166-1172. [Cheng Qian, Ling Supei.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affecting factors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33(10): 1166-1172.]
- [17] 王萍, 刘敏. 地理要素在传统无形文化传承中的空间印迹——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J]. 地理研究, 2020, 39(8): 1807-1821. [Wang Ping, Liu Min. The spatial influence of geography on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intangible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Shanxi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0, 39(8): 1807-1821.]
- [18] 向远林, 曹明明, 闫芳, 等. 陕西传统村落的时空特征及其保护策略[J]. 城市发展研究, 2019, 26(12): 27-32. [Xiang Yuanlin, Cao Mingming, Yan Fang et al. The impact of adjusting birth policy on China's housing demand.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9, 26(12): 27-32.]
- [19] 屈册, 张朝枝. 元阳梯田原住民的遗产认同: 基于话语分析的视角[J]. 旅游学刊, 2016, 31(7): 43-51. [Qu Ce, Zhang Chaozhi. Aboriginal heritage identity in Yuanyang Rice Terraces: On the perspective of discourse analysis. Tourism Tribune, 2016, 31(7): 43-51.]
- [20] 王雪, 青木信夫, 徐苏斌. 基于地方依恋反思旧城更新语境下的失所现象——以天津西沽南拆除计划为例[J]. 人文地理, 2019, 34(5): 44-52, 108. [Wang Xue, Aoki Nobuo, Xu Subin. Reflection on displacement in the context of inner-city re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ce attachment: A case of the demolition project of Xgunan, Tianjin. Human Geography, 2019, 34(5): 44-52, 108.]
- [21] 庄淑蓉, 杜芳娟, 叶仕安. 多维贫困视角下的旅游扶贫与空间正义研究——以贵州施秉喀斯特世界遗产地社区为例[J]. 人文地理, 2020, 35(2): 32-38. [Zhuang Shurong, Du Fangjuan, Ye Shi-an. Research on spatial justice and pro-poor tou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The case study of the community in Shibing Karst world heritage site in Guizhou Province. Human Geography, 2020, 35(2): 32-38.]
- [22] 郭文, 王丽. 文化遗产旅游地的空间生产与认同研究——以无锡惠山古镇为例[J]. 地理科学, 2015, 35(6): 708-716. [Guo Wen, Wang L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identity in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destination: A case study of Huishan ancient town in Wuxi,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35(6): 708-716.]
- [23] 屈册, 张朝枝. 谁的遗产?——元阳梯田旅游经营者遗产认同比较[J]. 热带地理, 2016, 36(4): 524-531. [Qu Ce, Zhang Chaozhi. Whose Heritage? A comparison between nonlocal and local tourism business's heritage identities in the Yuanyang Terraces Area. Tropical Geography, 2016, 36(4): 524-531.]
- [24] 何银春, 梁越, 曾斌丹. 遗产化进程中遗产认同的内涵及形成路径——以世界遗产永顺老司城为例[J]. 热带地理, 2019, 39(5): 749-758. [He Yinchun, Liangyue, Zeng Bindan. The connotation and formation path of heritage identity in the process of heritagization: A case study of Laosicheng World Heritage, Yongshun. Tropical Geography, 2019, 39(5): 749-758.]
- [25] 姜辽, 苏勤. 古镇文化身份脆弱性的社会建构及其意义——多元话语分析模式的尝试[J]. 地理科学, 2014, 34(7): 840-847. [Jiang Liao, Su Qin. Social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vulnerability in ancient town and its significance: A new mode of pluralistic discourse analysi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34(7): 840-847.]
- [26] 张剑葳, 高俊, 王雄志, 等. 遗产的价值、保护、利用与围绕主体问题的讨论——首届遗产旅游联合工作坊笔谈[J]. 中国文化遗产, 2020(1): 45-56. [Zhang Jianwei, Gao Jun, Wang Xiongzhi et al. The valu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heritage and the

- discussion around the main issues: A written talk of the first joint workshop on Heritage Tourism. *China Cultural Heritage*, 2020(1): 45-56.]
- [27] 刘南威. 中国古代对南海诸岛的命名[J]. 地理科学, 1994, 14(2): 101-108. [Liu Nanwei. Ancient Chinese naming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1994, 14(2): 101-108.]
- [28] 刘南威, 张争胜. 海南《更路簿》解读[J]. 南海学刊, 2017, 3(1): 22-26. [Liu Nanwei, Zhang Zhengsheng. Interpretations of Hainan fishers' *Genglubu*. *The Journal of South China Sea Studies*, 2017, 3(1): 22-26.]
- [29] 刘南威, 张争胜. 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土地名源流及其历史文化价值[J]. 热带地理, 2015, 35(2): 162-169. [Liu Nanwei, Zhang Zhengsheng.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folk place names of the Xisha Islands and Nansha Islands and thei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Tropical Geography*, 2015, 35(2): 162-169.]
- [30] 刘玄宇, 张争胜, 牛姝雅. 南海《更路簿》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体记忆的失忆与重构[J]. 地理学报, 2017, 72(12): 2281-2294. [Liu Xuanyu, Zhang Zhengsheng, Niu Shuya. The memory loss and reconstru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South China Sea's 'Geng Lu Bu' collective memory.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7, 72(12): 2281-2294.]
- [31] 孙玉伟, 成颖, 张建军. 扎根理论方法论在国内图情领域的应用及其反思[J]. 图书馆学研究, 2019(19): 2-11+20. [Sun Yuwei, Cheng Ying, Zhang Jianjun. The application and reflection of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in the field of LIS in China. *Research on Library Science*, 2019(19): 2-11+20.]
- [32] 钱俊希, 杨瑾, 朱竝. 现代性语境下地方性与身份认同的建构——以拉萨“藏漂”群体为例[J]. 地理学报, 2015, 70(8): 1281-1295. [Qian Junxi, Yang Jing, Zhu Hong. The construction of place-ness and identit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emerging modernity: A case study of Han Chinese 'drifters' in Lhasa, Tibet.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5, 70(8): 1281-1295.]
- [33] Corbin J, Strauss A.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M]. Los Angeles: Sage Publications, 2014.
- [34] 夏代云. 论中国海南渔民对南海岛礁及海域的历史性所有权[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34: 11-17. [Xia Daiyun. On the historical ownership of the fishers in Hainan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and reefs and its waters.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 2016, 34: 11-17.]
- [35] 牛姝雅, 张争胜, 刘玄宇. 《更路簿》与潭门地方性的建构与再现[J]. 地理研究, 2019, 38(2): 445-458. [Niu Shuya, Zhang Zhengsheng, Liu Xuanyu. 'Genglubu' and Tanmen placeness's construction and reproduct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2): 445-458.]
- [36] 腾讯视频《记录》里的中国: 保卫南海的潭门渔民[OL]. 2014-07-04. <https://v.qq.com/x/cover/vbp7hd1yq4d7bvh/m0014d9q0c7.html>. [Tencent TV. China in the <Record>: Tamen fishermen defending the South China Sea. 2014-07-04.]
- [37] 黄晓华. 美丽篇章藉春风[N]. 海南日报, 2013-04-13(A01). [Huang Xiaohua. Beautiful chapter by spring breeze. *Hainan Daily*, 2013-04-13(A01).]
- [38] Munasinghe H. The politics of the past: Constructing a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heritage conserv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05, 11(3): 251-260.
- [39] Milošević A. Historicizing the present: Brussels attacks and heritagization of spontaneous memorial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18, 24(1): 53-65.
- [40] 魏雷, 朱竝. 地理学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地方实践[J]. 地理学报, 2022, 77(2): 492-504. [Wei Lei, Zhu Hong. The trans-local practic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77(2): 492-504.]

The Heritagization of Local Relics: A Case Study of *Genglubu*

Wu Chenhui¹, Zhang Zhengsheng²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Guangdong,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heritage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resource or means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jects and social governance. Heritagization is a process in which a historical remnant is officially recognized as 'heritage', and protected, developed and managed. However,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how the heritagization process takes place in local place and its mechanism. Taking *Genglubu*—guides written by Hainan fishermen recording navigation routes and other information for fish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as a case, this article reveals how *Genglubu* transforms int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place, and how different groups engage and interact in the heritagization process. This study is conducted based on fieldwork, including in-depth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Qionghai City and Wenchang City, Hainan Province, China during 2017 and 2019. We recruited a total of 72 interviewees, including 24 fishermen and residents in Wenchang and 25 counterparts in Qionghai, two editors, seven national or provincial level and 14 below the provincial level workers of government or public service institutions (e.g. museums). Each interview lasted between 0.5-1.5 h during which interviewees were allowed to answer each open-ended question according to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thoughts, and bringing up new topics was encouraged. This research employs the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to analyse the interview data for drawing findings. After the transcription of the recordings, the interviews are coded by three steps: open coding, axial coding, and selective coding, to attain the result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others' and Hainan fishermen interact in the heritagization of *Genglubu*, but the effect of 'others' is stronger. The meanings of *Genglubu* which shifts from defuncted 'secret guideline' in the private/domestic space to 'cultural heritage' supporting the nation's sovereignty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public/national space. The identity of fishermen has transformed into 'pioneers' or 'guardian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collection of relic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promote 'heritagization' and make different groups interweave with each other where fishermen can impact the understanding and behaviours of 'others' in the heritage work. *Genglubu* can become tourism resource. However, it has not yet become a strong 'selling point' to drive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the residents are in a weak position in the use of its economic capital. Heritagization helps evoke the faded memories of *Genglubu*, but 'individual' memories has been weakened and the place imagination has been restructured. *Genglubu* has a stronger rooting and effect in Qionghai than in Wenchang. This paper applies the combination of 'top-down' and 'bottom-up' approach to reveal the differences and intersection of the cognitions and behaviours between the two, with aims to provide a fresh insight for unravelling the heritagization of local relics transforming into 'cultural heritage', and how complicated place elements and social relations entangle in this process.

Key words: heritage; *Genglubu*; the South China Sea; identity; heritage tourism; cultural memory